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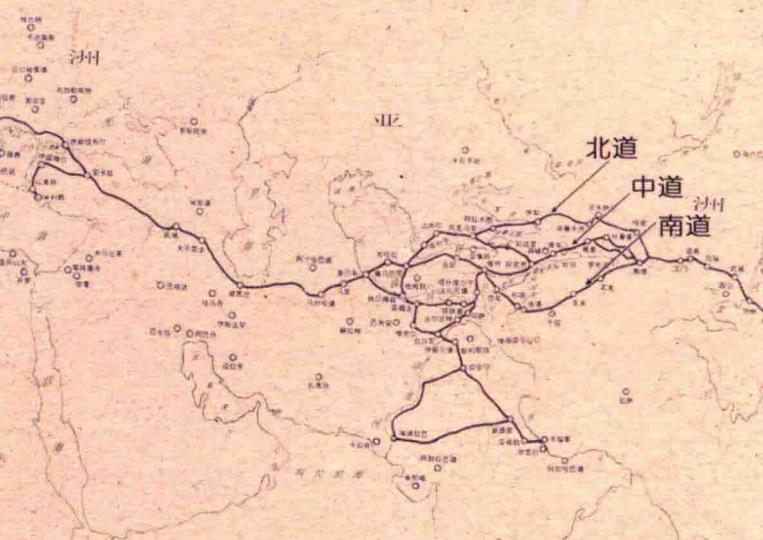
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资助出版

敦煌与丝绸之路

——浙江、甘肃两省敦煌学研究会联合研讨会论文集

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
中国丝绸博物馆
甘肃敦煌学学会
敦煌研究院

编



敦煌与丝绸之路

——浙江、甘肃两省敦煌学研究会联合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 赵 丰 罗华庆 许建平

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
中国丝绸博物馆

甘肃敦煌学学会

敦煌研究院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与丝绸之路：浙江、甘肃两省敦煌学研究会联合研讨会论文集 / 赵丰, 罗华庆, 许建平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308-14636-4

I. ①敦… II. ①赵… ②罗… ③许… III. ①敦煌学
—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K870. 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7232 号

敦煌与丝绸之路

——浙江、甘肃两省敦煌学研究会联合研讨会论文集
赵 丰 罗华庆 许建平 主编

责任编辑 张小萍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25

插 页 16

字 数 260 千

版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636-4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http://zjdxcbstmall.com>

前 言

赵 丰

敦煌，以其莫高窟为代表的中国中古时期的壁画、彩塑、写卷等为世人所瞩目。然而，于我个人而言，最为萦绕我心的当数敦煌所出的纺织品文物。

敦煌的纺织品有过数次大的发现。上世纪初藏经洞的开启，使得众多中古时期的纺织品得以面世，但因众所周知的原因随即流散世界各地。新中国成立后，经考古发掘，敦煌纺织品又有两次大的发现。第一次发现缘于莫高窟的维修。1965年，莫高窟第125、126窟窟前发掘出土北魏时期刺绣品残片若干。同年10月，为加固窟内空鼓壁画，工作人员在第130窟底层壁画岩孔内整理出残幡等共40件。同年秋天，工作人员在第122、123窟窟前发掘时，发现唐代残幡等13件。第二次发现主要出自莫高窟北区。1988—1995年，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人员对莫高窟北区的所有洞窟，进行了科学、全面、系统的清理发掘，于73个石窟中出土各类织物共计231件。与早先发现的织物主要为唐代不同，北区出土的纺织品，其年代集中在西夏到元代这一时期。

伴随数次发现，敦煌纺织品的整理和研究也随即展开。藏经洞所出、流散世界各地的敦煌纺织品，斯坦因、伯希和在其发表的报告中都附有初步研究。而后，英、法、俄、日等国的诸多学者都对这批纺织品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敦煌纺织品，其整理和研究则主要发表在《文物》和三卷本的《敦煌莫高窟北区考古报告》中。2006年起，借应邀为大英博物馆整理和研究斯坦因收集的中国纺织品之机，以及与敦煌研究院共同申报“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之机，东华大学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开始了全面收集二十世纪初流散到海外的敦煌丝绸资料的工作。截至目前，已整理英、法两国所藏的敦煌

丝绸资料，并已出版《敦煌丝绸艺术全集》（英藏卷）和《敦煌丝绸艺术全集》（法藏卷），而《敦煌丝绸艺术全集》（俄藏卷）也即将面世。同时，藏于印度、日本、中国敦煌和旅顺的敦煌丝织品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也正在推进中。

整理之外，敦煌丝绸保护修复工作也同步展开。中国丝绸博物馆与敦煌研究院合作开展了莫高窟纺织品的保护与研究工作，“千缕百衲——敦煌莫高窟出土纺织品的保护与研究”专题性展览就是合作的一部分成果展示。中国丝绸博物馆和敦煌研究院对敦煌出土的代表性纺织品进行保护和修复，不仅了解其纤维和质地，同时分析其色彩和染料；不仅进行大量的图案复原，同时对服饰及其形制进行修复和复原；不仅将其中 60 余件藏品整理展出，同时也对这些文物进行预防性保护。展览以图片和文字的形式介绍了敦煌丝绸的考古发现及敦煌研究院考古工作者在敦煌纺织考古领域所作的贡献。同时展示了敦煌纺织品的保护与研究，展出的 62 件纺织品文物，涵盖北朝、盛唐和元，着重展示了中国丝绸博物馆对敦煌考古出土纺织品所开展的保护、修复与研究工作。另外，展览还对英、法、俄、日等地收藏的敦煌丝绸及相关研究成果作了介绍。

配合展览，中国丝绸博物馆还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染织服饰专业委员会、甘肃敦煌学学会、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联合主办了“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暨学术讲座。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外众多敦煌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就“敦煌学研究的新收获与新动向”、“敦煌与丝绸”两项主题分享了各自最新的研究成果。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所收的即众多专家学者所提交的论文，其研究的成果涵括了佛教、壁画、古籍、文学、书法、乐舞、服饰、丝绸等敦煌学领域的各个方面。

因此，我要在这里感谢对展览和会议作出各种贡献的机构和个人。首先是敦煌研究院，从樊锦诗院长到罗华庆副院长，为敦煌丝绸展览的筹备提供了强大的支撑。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的各位工作人员，从主任到库保员到保护师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别是何明阳，还承担了大量的修复和保护工作，并撰写了论文。敦煌研究院的张先堂、赵声良、沙武田等参加了学术讨论会，为会议提交了论文。其次，我要感谢浙江大学古籍所以及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的众多专家学者，特别是秘书长许建平，还有研究会里的毛建波、朱大星、窦怀永等各位对于会议的大

力支持。之三,我要感谢东华大学以包铭新教授为首的敦煌染织服饰史的研究团队,其中王乐长期从事敦煌丝绸研究工作,并在会上作了精彩报告。

当然,我也要感谢我的同事,中国丝绸博物馆暨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的各位同仁,他们自敦煌展览项目确定之后,就开始大力推进敦煌文物的研究、保护和展示等各项工作,其中所经历的时间较长。在展览的同时,还有图录和论文的编辑,也花费了他们大量的精力。

我还要感谢浙江省社科联蒋承勇主席,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莅临会议,并作了热情洋溢的报告。

最后,感谢常沙娜、扬之水、韦陀等一批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大家,也参与了我们的研讨会,为我们的各项活动增光添彩。

我希望,我们还能适时地举办关于敦煌学和丝绸之路的各项活动。

2013年12月30日

序言一

樊锦诗

杭州与敦煌，东西遥隔千里的两座城市，因丝绸而结缘。

杭州自古即有“丝绸之府”之称。距今四千多年的良渚出土丝织物就已展示了杭州丝绸的悠久历史，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的诗句赞美了当时杭州丝绸织品的精美，旧时清河坊鳞次栉比的绸庄更见证了丝绸经济的繁荣。今天杭州仍以琳琅满目、精美鲜艳的丝绸织品吸引着八方宾朋。

敦煌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枢纽、军事重镇、商业贸易的集散之地，也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六种宗教、十余个民族文化的融汇之处。敦煌莫高窟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古代实用的丝绸织物，特别是藏经洞中保存了一大批以丝绢制作的绘画、幡、经帙等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流散到英、法、俄、日等诸多国家，吸引着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目光。

于是，正值敦煌研究院在浙江美术馆举办《煌煌大观》期间，敦煌研究院也与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了“千缕百衲——敦煌莫高窟出土纺织品的保护与研究”展览，古老的敦煌丝绸在古城杭州得以展示其绰约风姿。展览既介绍敦煌丝绸考古的发现、敦煌丝绸在世界各地的收藏，也展示敦煌丝绸文物保护修复的成果。

为了配合此次敦煌艺术与敦煌丝绸展览，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与甘肃敦煌学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染织委员会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又遍邀国内外众多知名的敦煌学专家学者，召开了“敦煌与丝绸之路”国际学术会议。围绕“敦煌学研究的新收获与新动向”“敦煌与丝绸”两项议题，与会学者发表了敦煌学研究领域各自最新的成果，缘此也就有了此论文集的编辑问世。

祝贺敦煌学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结出更为丰硕的成果。

2013年12月29日

序言二

常沙娜

敦煌历史悠久，各个历史时期的佛教艺术在此传承，佛教艺术在敦煌艺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佛教宣扬“普度众生、与人为善”的教义，这在敦煌壁画上多有表现，北魏时期“舍身饲虎”、“九色鹿”等壁画故事就是表现佛教教义的生动实例，至今仍具有深厚的魅力。敦煌艺术的图案大多来自大自然，牡丹（春）、莲花（夏）、菊花（秋）、梅花（冬），这类花卉很早就已具有特殊含义。这类花卉经常在敦煌艺术中作为装饰得以展现，但敦煌作为东西方交通的重镇，同时也融合、吸收了西方的艺术元素。

敦煌艺术得以历经千年存留至今，主要在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魅力。如何保存和保护好并且弘扬敦煌艺术，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如何将传承、发展与创新结合起来，也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解决的课题。具体到敦煌壁画的临摹，复原临摹要结合科学的研究。

虽然我已经沉浸敦煌学几十年，但还未真正参加过像“敦煌与丝绸之路”这类的专题研讨。敦煌学的早期研究者中有很多是浙江人，浙江与敦煌学的发展关系密切，今天能在浙江杭州参加这样一次会议也是非常难得。因此，这样的研讨会非常有意义，藉此机会大家得以共同探讨敦煌学的发展和推进，分享敦煌学研究的新收获与新成果。

敦煌是一个宝库，而这个宝库的“挖掘”需要更多的学人共同参与、共同研究，我愿与大家共襄此举。

2013年12月29日

致 辞

蒋承勇

尊敬的樊锦诗院长，尊敬的常沙娜教授，尊敬的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与嘉宾：

继往开来的 2013 年年末，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中国丝绸博物馆和敦煌研究院联合举办“千缕百衲——敦煌莫高窟出土纺织品文物的保护与研究”展览。作为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及重头项目，在开展的第二天，即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召开“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暨学术讲座。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将重点围绕“敦煌学研究的新收获与新动向”和“敦煌与丝绸”两个主题，进行交流探讨。我谨代表浙江省社科联，向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及领导表示诚挚的欢迎。

敦煌是世界四大文明的交汇点，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世界不同文化互相影响、和谐共处的典范。基于此，一百多年来，对敦煌美术、敦煌写卷及出土文物的研究，在学界独树一帜，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其内容涵盖政治、历史、经济、宗教、语言、文学、科技、社会生活和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它们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浙江和敦煌虽然相隔万水千山，但浙江学者却和敦煌有着不解之缘。一百多年来，罗振玉、王国维、常书鸿、姜亮夫、史岩、王伯敏、蒋礼鸿、郭在贻等，一大批浙籍或在浙江工作的学者都为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老一辈学者的培养和熏陶下，薪火相传，浙江的敦煌学研究成果丰硕，影响深远。近年来，经过浙江省敦煌学研究会及其广大会员的共同努力，敦煌学研究在浙江得到进一步壮大，研究人员老中青布局合理，梯队有序，研究内容涵盖文献整理、文物保护、艺术研究、数字化技术等多学科的综合体系，突破了原有的地域和空间及学术分隔的限制，

向着更高、更深的层次和方向发展。以张涌泉教授、许建平教授为首的团队在敦煌吐鲁番文献的整理研究方面,以赵丰教授为首的课题组在丝绸研究方面,以潘云鹤院士、鲁东明教授为首的课题组在利用多媒体与智能集成技术进行敦煌壁画数字化保护与利用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浙江成为海内外公认的敦煌学研究中心之一,并持续处于国内外研究的领先水平。

敦煌学的研究,已经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取得了许多里程碑式的成果,不仅丰富了传世文献的宝库,也促进或带动了其他学科的发展。我们谨向国内外对敦煌学研究作出贡献的专家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更期待着在座的专家学者利用此次相聚一堂的机会,金声玉振,抒发宏论,继续贡献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祝大会圆满成功!

祝大家心情愉快、身体健康!

2013年12月29日

目 录

前 言	赵 丰(1)
序言一	樊锦诗(4)
序言二	常沙娜(5)
致 辞	蒋承勇(6)

敦煌学研究的新收获与新动向

略谈近年来的敦煌石窟研究	赵声良(3)
粟特美术影响下的敦煌石窟营建及其图像研究简史	沙武田(16)
唐宋时期大众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的研究	杨秀清(22)
具象与实用:21世纪敦煌美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胡同庆(52)
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简介	刘进宝(70)

敦煌文献研究

罗振玉信札中的敦煌学史料	蔡渊迪(79)
敦煌写卷谶纬佚文续辑	窦怀永(92)
跋杏雨书屋藏敦煌《汉书》写卷	秦桦林(104)
敦煌道经略论 ——从敦煌道经论道教文化的包容性	朱大星(112)
从敦煌写卷看《中华道藏》校录失误	谢 明(122)

《老子化胡经·玄歌》用韵考	郜同麟(135)
新认定吐鲁番出土《楞子赋》及相关残片考	张新朋(143)

敦煌与丝绸

吴绫与柿蒂绫	赵丰(151)
鸟蝶双飞入绣衣	
——丝绸图案讲述的故事	扬之水(157)
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残片研究	韦陀(167)
壁画丝踪	
——兼及观瞻斯里兰卡石窟得到的启示	柴剑虹(174)
莫高幡影	
——敦煌出土佛幡的种类与制作	王乐(179)
中国古代染织工艺在敦煌服饰图案中的体现	杨建军(190)
敦煌莫高窟出土纺织品的科学认知	周旸(211)
“敦煌与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综述	关思思(215)
后记	许建平(218)

敦煌学研究的新收获与新动向



略谈近年来的敦煌石窟研究

敦煌研究院 赵声良

作为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敦煌石窟的研究一直备受关注。敦煌石窟包括七百多座洞窟,其中大量的彩塑、壁画是研究古代历史、艺术、宗教等领域的重要资料。不过,对敦煌石窟的全面调查研究是十分浩大的工程,敦煌研究院经过了近七十年几代人的努力,大体搞清了每一个洞窟的基本内容,并在图像考释、年代划分、艺术风格等方面作了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国内外不少学者加入了石窟研究的行列,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敦煌石窟研究的特殊性,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加强,比如详尽的考古报告编撰才开始出版,对时代和内容的判定仍有不少需要深入研究,等等。本文拟对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的敦煌石窟研究作一简单的回顾,这十余年来,从不同的学科研究敦煌石窟的成果颇多,限于本人学识,固难周全,失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正之。

一、敦煌石窟考古研究

石窟考古是敦煌石窟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这方面的重大成果,首推《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①,此书是敦煌石窟的第一本考古报告,主要内容是对洞窟内容作详尽而客观的

^① 樊锦诗等《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年。

记录,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记录,而且在敦煌石窟的考古研究上具有多方面的突破:首先,通过敦煌早期三窟的主题内容——坐禅修行与弥勒信仰之密切关系,确认这种单纯的弥勒信仰源自犍陀罗传来的佛像体系,而与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典型的北魏石窟图像不尽一致,敦煌所体现的相对要早一些。其次,通过比对发现,早期三窟窟形、龛形、塑像、壁画内容、故事画构图、凹凸画法,以及一些细部特征,明显受到了西域的影响,与龟兹石窟关系密切,并为敦煌北朝二期石窟所继承,给予敦煌以东的河西魏石窟以强烈的影响;另一方面,报告强调本卷石窟中出现的阙形方龛和阙形建筑形象,仅见于敦煌莫高窟(早期,并延续至二期,以及邻近的文殊山早期个别洞窟),以东的中原和其他各地石窟均无此龛形,与云冈石窟的屋形龛大异其趣,就此揭示了与早期三窟同时或更早的敦煌、瓜州墓地频繁出现双阙建筑,敦煌及河西走廊许多砖雕墓照墙上也雕有双阙形象,进而说明本卷第275窟的阙形方龛体现的其实是敦煌及河西走廊的本地因素,与大同云冈石窟并无直接关联。第三,过去认为第275窟原建、重建、重绘有五个时代,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报告确认原建、重建、重绘至多有北凉、隋、五代三个时代,没有宋代和西夏。其四,本卷洞窟中一向较少受人关注的第266窟,现有的塑像、壁画在隋代一次完成,因而被定为隋窟。但是考察发现其洞窟形制与早期第272窟十分相似,穹窿形的窟顶具有早期的特点,窟内的图像布局亦与早期第272窟相当一致,早期开窟隋代补绘的可能性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其五,通过对壁画的仔细观察,揭示了北凉、隋至曹氏归义军五代时期从起稿、敷色、晕染、线描的全过程及其特点,比过去的敦煌艺术研究更加细致,阐述更加明确。此外,发现了一些过去所没有观察到的迹象,例如,注意到早期壁画绘制的起稿、晕染应是在泥壁湿润的情况下完成,属于湿壁画的绘制方法。待泥壁干燥后敷罩白粉,于其上细笔勾勒,描绘细部。因年代久远,含胶的白粉层几乎悉数脱落,早期壁画面目全非,只留下绘制开始阶段便为黑色的粗线勾染和土红色的起稿,可能是湿壁画法的遗迹,如果此说可以成立,可依此纠正美术史上认为中国古代没有湿壁画的观点。

《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的特色还在于,刊出了包括测绘图版、摄影图版和数码全景摄影拼图。尤其是测绘图采用了新的科技成果,通过数码扫描技术,结合工作人员的实地调查,其准确性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程度。考古报告的意义在于通过文字和图片的形式详尽记录考古遗址、遗迹,假设原址由于某种因素不得存在,通过考古报告可以再现和复原出遗址、遗迹,而这一点向来仅仅是一种考古学的理想。《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的出版,使我们相信,通过这一份考古报告的文字记录和其中的线描与照片,复原这些洞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是十余年艰苦调查研究的结晶,有的学术见解,可能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在酝酿。这一考古报告从资料的详尽程度和结论的令人信服程度,以及研究方法的可借鉴程度都是极高的。这一考古报告的出版,在中国石窟考古研究的发展中掀开了新的一页。同时通过敦煌考古报告撰写的历程,也表明了真正的学术研究决不是靠“大跃进”的办法,快速“打造”能够成功的。如果没有反复的调查和持续不断的努力,没有充分的深思熟虑,而在短期内为应付某种需要而拼凑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解决学术问题的。

此外,在石窟考古领域还有一些新的成果。1982年出版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是敦煌石窟考古工作的最基本的工具书,此书于1996年进行过修订。虽说仍存在过于简略的问题,但作为一种工具书,在石窟考古研究中依然有不可替代的功能。进入本世纪以来,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在石窟调查研究中发现有一些洞窟是《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所未记录的,这些洞窟大多是由于壁画和塑像不存,洞窟残破等原因,当时未作记录,而从考古学的意义来说,则是应该记录的。因此,进行了补记。在编号形式方面,采用不增加原有窟号序列的办法,沿用原有窟号,而附英文字母(A、B),这样新编的洞窟达33个。于2007年发表了这一编号^①。这是对《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的补充完善。鉴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记录过于简略的状况,2011年出版的《甘肃石窟志》^②,对石窟的记录增加了高度、宽度等测量数据,记录供养人题记,并对重要洞窟配上实测图和照片。由于此书的体例所限,对

^① 樊锦诗、蔡伟堂《关于敦煌莫高窟南区洞窟补编窟号的说明》,《敦煌研究》2007年第2期,页44—50。

^② 敦煌研究院编《甘肃石窟志》,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